

第九届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获奖论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编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第九届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获奖论文集 ●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编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特等奖

- 2 蒋述卓 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
- 14 刘厚生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
- 24 饶曙光 华语电影新发展及其前景

一等奖

- 40 姜 昆 使二人转更好地“转”下去
- 48 张德祥 从“为人民”到“源泉”论
——《讲话》对中国文艺思想的伟大贡献
- 58 汪人元 戏曲音乐创作谈要
——优秀戏曲唱腔的五个标准
- 72 陈晓云 明星消费机制建构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 83 施万春 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
——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
- 90 张蕴和 中国相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发展取向
- 103 许 锐 “舞林争霸”到底争什么？
——从电视选秀看舞蹈艺术如何面对商业传媒
- 109 黄 涛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偏误与矫正
- 121 尹 力 关注戏剧性杂技“剧”时代的新探索
——解读原创杂技剧《霸王别姬》

- 127 向云驹 “美丽中国”的美学内涵与意义
——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一点体会
- 133 谢有顺 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 173 傅 谨 中国戏剧的价值重建
- 182 尹 鸿、李瑗瑗 从重制作向重创作的美学转向
——2012年中国电影创作
- 203 张瑞田 “二王”何以滥觞
- 209 李树榕 文化批判：深度≠高度
——从《甄嬛传》看我国近期后宫戏的思想境界
- 216 王宏伟 “文化自觉”与民族题材美术
- 224 刘锡诚 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
——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
- 239 陈志平 笔中有诗
——文学因素对黄庭坚书法的影响
- 255 唐 卫、刘金龙 郎静山“集锦摄影”的中国美学
——“六法”失读，谈艺应从“具体艺理”开始
- 271 楚小庆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
- 289 王 宁 浮华背后的危殆：论当代昆剧的隐性消亡

二等奖

- 302 张永刚 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倾向
- 323 李蓓蕾 以大文化思维方式构建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批评模式
- 332 周 静 网络文学批评的难局与新路
- 342 李仰智 真实：“花非花”
——一个问题、两部小说、三点启发
- 362 张 伟 “美丽中国”建设与当下艺术美的回归

- 376 朱辉军 “中国梦”的艺术追求
- 382 申霞艳 “梁庄”与中国想象
- 396 王晓琳 秋天往事：露从今夜白
——阅读的诗与思
- 421 聂 茂 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 451 许柏林 两个“万一”的心尖震颤
——读孙家正同志的《春雪》有感
- 456 杨四平 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问题
- 481 谭静波 《程婴救孤》锻造出崭新的豫剧“衰派”艺术
- 492 陈达红 误读与偏颇：表现主义戏剧接受的历史反思
- 507 孙豹隐、孙 昭 推动戏剧艺术大发展大繁荣断想
- 529 侯光明 时代呼唤“文化大片”
- 534 高敬瑜 发现“规定行动表演法”
- 544 娄文利 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傅庚辰及其歌曲创作
- 565 吴思富 音乐的“温度”及其意义立场
——对两种音乐创作理念的美学反思
- 594 杨 嵩 驳声乐诸唱法论
- 598 王思琦 “谁的好声音”？
——由《中国好声音》看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取向及其他
- 607 蔡乔中 朱践耳交响乐创作技法的民族化思维
- 618 谷鹏飞 从民族性、西方性到中国性
——“全国美展”与中国当代主流艺术的身份认同
- 633 赵 昆 待细把江山图画
——以井冈山为例
- 648 李蒲星 关于历史画创作的几个问题
- 658 尚 辉 壮阔与崇高
——新时期新疆题材美术创作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成就

- 681 李昌菊 花开时节逐梦缤纷
——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品读
- 687 沈鸿鑫 谈黄永生的上海说唱节目
- 704 潘 讯 关于“苏州评弹口述史（百年）”的构想
- 721 刘青戈 “苟活”之批判与人性生存的拷问
——舞剧《洛神赋》的思想深度与艺术超越
- 728 刘 勃 传统文化复兴的科学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保护
- 737 张 勃 探求传统节日的真与善
——评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745 应爱萍 皮尔斯符号学与摄影理论研究
- 760 徐东树 试论“字如其人”的历史合理性及其现实困境
——以张瑞图的历史评价为例
- 768 衡正安 书法（文字）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 778 陈 智 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文化品格
- 794 谢建华 当代书法的类型分析与批评
- 808 朱培尔 “技进乎道”：一个未竟的使命
- 813 林宏伟 试论文艺院团体体制改革中的杂技创作
——关于杂技订单式创作的设想
- 822 孙书文 主旋律影视的大众文化认同
——论“赵冬苓编剧”
- 附录
- 836 中国文联关于表彰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作品和组织工作
先进单位的决定

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聂 茂

文化想象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 70 年代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词语。

20 世纪末，“全球化”一词越来越热，变得家喻户晓、老孺皆知，与此相关的书籍、文章更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然而，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以及它的作用和意义，学术界却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大致而言，主要有四种不同意义的理论流派：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或称新左派、新自由派、怀疑派和转型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对于全球化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却是，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身份界限，“模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所隐含的性格特征，为第一世界更好地“掌控”第三世界投下了理论的“烟幕弹”。这样的共同点也恰恰表明了笼罩着“平等”和“互助”之大旗下，种类与肤色，民族与文化，土地与战争，寓言与神话，上帝与撒旦仍然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扩张、争夺乃至厮杀——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仍每时每刻发生在全球的各个角落。

其实,作为一种“文化想象”,^①所谓“全球化”指的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及其文化进程的某种模式;它是“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②。

在对全球化语境的考察中,人们的思维惯性容易陷入两个逻辑怪圈:即全球主义论和全球中心论。前者“是指他们设想好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优先权,一种本土必须服从全球的权力结构存在”;后者“是指认这种跨国的潮流与进程决定本土变革的积极性”。因而,“有关全球化的解释和‘话语’是一种对地域和本土的偏见”。^③

这两种逻辑怪圈都是强势的第一世界之“文化霸权”^④生发出来的“自在预想”:他们拥有主宰这个“世界舞台”的优先权,他们的本土观念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他们的变革价值具有世界的共性。所有落后民族、弱势文化都必须按照他们的模式,接受他们的“教化”“扶助”和“规范”。所有背离这种话语体系的行为都将受到“全球化”的经济“封锁”、政治“打压”和文化“隔离”,因而也就必将被“世界”所抛弃,被“全球化”浪潮所淘汰。在这种逻

① 参见 G. Eric Hansen, *The Culture of Stranger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Exchange*, London,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以及 Bendie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有关“文化想象”的命题在有着东方背景的西方学者、作家作品中也有很多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萨伊德和拉什迪。请参见 Edward. Said, *Colonialism, Language & Imagination*, Londo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90 和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Books; New York, USA: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 1991。

② 刘康认为:“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文化与商品的紧密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参见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 年第 10 期。

③ 参见 Arif Dirlik,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in *Global/Loc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又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少辉译,载《天涯》2000 年第 3 期;同时,所谓全球中心论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所有的界限都弄混了。阿里夫·德里克这样说,“在第三世界的人出没于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则奔波于第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群,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所有的边界和界线都被搞乱了。”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71 页。

④ “文化霸权”是指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由上而下的广泛动员、发动和宣传活动,获得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被统治、被领导阶层的认同、支持和参与。有关这一概念的阐述请参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8。

辑怪圈里,“全球化”差不多就成了“全球白人化”^①之隐形符号。

严峻的事实在于: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在“现代性的追寻”^②中却不能回避这种“偏见”。日本学者竹内所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③其明显征兆是第三世界较少拥有自己的体格“范式”(paradigm),连时间的表述都是沿用西方以基督耶稣诞生为纪元的体制。^④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认为,不应忽视在日本和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已采用公历(Western Calendar)纪年问题。^⑤它表明,人们现在使用的时间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西方人按照自己的“规制”方式创造出来的。第三世界的所有文本由此都打上了西方时间陈述的烙印,其情状跟全球化语境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定量标准和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沟通、交流一样,都是同一强势体制里不同层次的话语符簇。第三世界要想与第一世界“对话”必须接受这个最基本的“共识”或“精神条件”^⑥:因为“公历组织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了解,给‘历史’以意义,也就是给‘现实’以意义。没有公历的话,历史与现实这些词根本无法成立”^⑦。这个“精神条件”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划分之日的“历史”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实”至今,并将继续延伸到将来的相当一段时期。

但事情的真相在于,第三世界在现代化的追寻中对第一世界有着强烈情感

① 拳王阿里批评道:“在当今社会里,白人总是与‘好’的东西有关。耶稣是白人,牛仔是白人,他们戴白帽子骑白马,天使吃的饼是白的,非洲之王猿人泰山也是白人。而黑色的东西总是‘坏’的:魔鬼吃黑饼,戴黑帽,养黑猫,干黑道敲诈的勾当。”因而黑人必须接受白人的“教化”和“规范”,世界才会安宁、文明。参见 Marlo Thomas, *The Right Words at the Right Time*, New York: Atria Books, 2002, p.2。

② 参见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 1991; 而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话语在“现代性追寻”上的表现,林敏和玛丽亚的专著里有过精辟的分析,请参见 Lin. Min & Maria Galikowski,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③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参见 Mafei K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7。

⑤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 毛泽东把第一世界/“西方”作为他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条件”。他说:“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⑦ 参见李杨:《抗争宿命之路》,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投注的同时，第一世界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也恰恰将目光对准了第三世界的广阔天地。白璧德说：“没有东方，西方就不存在了。”^① 东方犹如镜子上的“锡皮”或显微镜上的“粪便”^②，让西方清晰地照出自己，或者通过“粪便”的检验，看清自己得了什么病。学者索飒直言道：“一个医生了解病人的病情时，往往先要检查他的粪便。第三世界就是当今世界的粪便。世界，尤其是富裕国家，它们的许多病相显示在第三世界，它们把致病的毒素倾泻到第三世界。”总之，东方的主体性总是附加在西方的审视之中，东方只是西方的一个“幻影”。^③

萨伊德指出，这个“东方”乃是被东西方对立两分思维、以西方为中心投射出来的“非我”，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东方主义的错误“原因不在于它只是对东方语言、社会、民族进行文物式的研究，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东方主义从未经批判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研究一个异质的、动态的、复杂的人类现实；这意味着既存在一个永恒的东方现实，也存在一个相反的，但同样永恒的西方本质；西方远远地、亦可以说高高在上地打量着东方”^④。

要言之，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优势，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永恒”和“超然”的世界性价值，将自身的“偏见”和“想象”编码在全球化文化机器的运作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文化处于边缘的、被压抑的状态，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着威胁，并事实上受制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贬抑和渗透之中。因此，第一世界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控制、压抑和吸引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反抗、拒绝和反渗透就长时间地成为各个时代的主题。^⑤

讽喻的是，如同历史话语中的“时间”是采用西式体制的表述一样，“第三世界”这一指称本身也是来自于第一世界的“命名规制”中。有人认为，

① 见白璧德：《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108 页。

② 参见索飒：《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读书》1991 年第 1 期。

③ 所谓“幻影”，就是一种原体的影像，没有自身模型的仿造。参见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trans.) by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 (e), 1983.

④ 参见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⑤ 参见 [美]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 年 6 期。也见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 年第 6 期。

这个宏大术语首先是由法国的一位地理学者罗维（A.Sauvy）在1952年8月号《法兰西观察者》杂志上所提出来的：“我们经常热衷谈论两个世界（欧美集团和东欧集团），它们可能的战争和共存等等，却忘了更重的第三个世界，虽然按历史发展它是最先出现的……”^①

这个命名表明了“第三世界”先于历史存在的事实，但作为辩证的对立面，它的主体性却只能通过第一世界的“审视”才能凸显出来。这种“审视”往往以第一世界的价值体系作为“过滤”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变迁，昭示了赖波儿（V.S. Naipaul）在其著作《白与黑》中所谴责过的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②的自大心态。

尽管“第三世界”的叙事指称最先是由第一世界的学者提出来的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方位术语，但是，随着五六十年代亚非国家的自决运动和独立建国，以及1955年印尼苏卡诺总理首倡“不结盟国家会议”，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③和“南北关系”^④的巨型理念，则纷纷在全球化视野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

① 王浩威：《回归和超越》，收入其书《台湾文化的边缘战斗》，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6—67页。其实，“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于50年代在法国出现时，正值美苏两个大国意识形态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当时法国一些学者（如Claude Bourdet, Alfred Sauvy, and Georges Balandier）使用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原本取“第三等级”（Le Tier Estate）之旧意，指那些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成意识形态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后来沿用这一名称，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抗议性的自称或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今天这个术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参见John T. Marcus, *Neutrality and Nationalism in France* (New York: 1958) and Peter Lyon, “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ty” (Review of Politics, April 1960)。

② 参见Shiva Naipaul, *Black and White*, London: H. Hamilton, 1980和Lawrence E. Harrison & Samuel P. Huntington,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又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③ 有关“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请参见Rapley John,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US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Julie Fisher, *Nongovernments: 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1998; Gavin W. Jones & Pravin Visoarian, *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onesia, Brazil,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在地理位置上，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地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关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9、306—307、522页。

治层面上结出了令人惊喜的丰硕成果。

第三世界文学的叛逆表达

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相伴而来的“第三世界文学”在文本的表述上虽然有滞后数十年之遗憾，^①但如同第三世界被命名前就已先于历史存在的事实一样，“第三世界文学”的时代疆域也早已发端于五六十年代的非西方各国。而更早的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则可以看作是“第三世界文学”滥觞之基石。

韦勒克说，歌德所描绘的构想是指向未来的大理想，即当所有的文化确实融合一体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但理想的达成是以牺牲各国的特征为代价还是保持各自的特征？世界文学能真正统一起来么？^②对这些质疑的辨伪解答，正是“第三世界文学”提出的潜在理由。

毋庸置疑，第三世界文学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起伏转型而摩踵展开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血烟糅杂的殖民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殖民主义者及其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遗产却依然清晰可见。莫蒂默比（V.Y. Mudimbe）指出，西方之“殖民”使得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人民在理解自己身份的时候，根本无法构建所需要的思想世界。因为这些“思想世界”早已由西方人按他们头脑中的非洲或者其他第三世界社会文化的样式构建好了。^③这种被“殖民者”“建构好了”的烙印不仅见之于地理上的区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更见之于文化上的血脉理路，不少本土文明都渗透了原殖民者的“强奸犯的血液”^④——语言的异化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在受殖民的土

① “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到80年代初才由陈映真、李欧梵、郑树森和刘绍铭等人提出。参见刘绍铭散文集《遣愚衷》，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见侯健：《中国小说比较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3年版，第3—4页。

③ 参见V.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张承志：《真正的人是×》，见《大地散步》，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地上杂交生根就是这种“耻辱血液”的原始凭证。

语言的“遭受强暴”，成了第三世界作家首先面临的选择尴尬，特别是在“国家/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还充满危机时，这些作家必须既战斗又写作。南非作家理查德·雷弗（R. Rive）所谓的“抗议文化”（the culture of protest）^①或巴勒斯坦文学史者卡那法尼（G. Kanafani）的“反抗文学”（resistance literature）^②，都是对这种身处尴尬的第三世界作家恰如其分的定位表达。

令人欣慰的是，在内外交困的对第一世界的“抗议”或“反抗”中，第三世界作家在艰难的处境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文坛上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捷克的塞佛特、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南非的戈迪默、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墨西哥的帕斯等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论这种奖项的评委是否戴有第一世界的“有色眼镜”，仅就获奖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第三世界文学的不同板块在全球化语境下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自己“真诚的声音”。

然而，在对本土文化母题的发掘中，第三世界文学“真诚的声音”却成了“一个形影暧昧的吊诡者”——这一点在萨伊德和拉什迪的“对话”中有过深刻的分析。^③戈迪默（N. Gordimer）曾经指出，“来到都市的乡下人”“回归非洲的知识分子”“祖先信仰和传教士文化的对立”“回归后面临的问题”和“人民解放”成为非洲黑人文化的母题。^④如果说，这种文化母题具有某种原始共性的话，那么，怎样表达这种母题则成为第三世界作家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① 请参见 Richard Rive, *Buckingham Palace: District Six*, London: Heinemann, 1987; 以及 Alex La Guma, (ed.) by Richard Rive, *Quartet: New Voice from South Africa*, London; Ibadan; Nairobi: Heinemann, 1965。

② 参见 Edward Said,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6。

③ 萨伊德认为拉什迪等人是东方主义者，而“东方主义者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篡改教义，使人产生怀疑，从而对教义抱不信任和不敬重的态度”。拉什迪回敬的是他表达的是一个正义作家在自由世界的独立思想。参见 Edward Said & Salman Rushdie, *Writers in Conversation (Video-recording): Edward Said With Salman Rushdie*, London: ICA Video, 1986; 又见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4) 一书之序文。

④ 参见 Nodine Gordimer, *The essential gesture: Writing, Politics and Places*, London: Cape, 1988 和 Nodine Gordimer & Lionel Abrahams (ed.), *South African Writing Toda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例如, 1986 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用的却是英文写作。他在英国利慈大学攻读英文文学。有人问: 西方人的语言能够表述出非洲人的文化吗? 无疑, 这些西化的作家学者成了“西方买办”和“后殖民”批评的鼓噪者们^①锁定的攻击目标, “西方话语的叙述者”(agent of narration)^②这样的评语是对他们最客气的讥讽。尼日利亚评论家秦威如(Chinweizu)尖锐地指出: “第三世界建立新秩序战争败北于英法各大学的草地上——因为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是在这些草地上放牧长大的。”^③

印裔美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也认为, 印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 他们学会了使用殖民地的角度与语言来看待和评判他们自己的国家;^④同时, 西方知识分子的体制角色及其功能, 十分残酷地在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之中无情地“打压”和“擦抹”相对于欧洲的“他性”的无名主体。^⑤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打压”和“擦抹”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抗议”和“反抗”说到底还是语言的“抗议”或“反抗”。因为, “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人们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 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⑥克里斯蒂娃认为, “语言里的欲望表达是接近文学艺术的征兆之门”^⑦。因此, 讨论第三世界文学对于第一世界话语的对抗作用时不能忘记两个基本条件, 即创作主体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读者对象。这两个条件构成了特定文学话语与其他文学话语有关联意义的文本/语境(text/context)以及显文本/隐文本(text/subtext)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 萨伊德和拉

① 参见 Kwama A. Appiah, “Is the Post-in Postmodernism the Post-in Postcolonialism?”, in *Critical Inquiry* 17, 1991, p.395.

② Homi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58.

③ Chinweizu, Onwuchekwa Jemie, Ihechukwu Madubuike, *Toward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④ Gayatri C.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⑤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271-313.

⑥ 参见 Ngni Wa Thiong'o, *Decolonizing the Mind*, Portsmouth, Eng.: Heiemann, 1966, p.4.

⑦ 参见 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 by Leon S. Roudiez; (trans.) by T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什迪对话中所说的“形影暧昧的吊诡者”、霍米·哈巴哈巴所指责的“西方话语的叙述者”以及秦威如和斯皮瓦克等人的批评针对的首先便是“语言关系”。

事实上,第三世界文坛的一些重要作家正是利用这种“语言关系”,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①尼克斯(Lewis Nkosi)^②和赖波尔(S. Naipaul)^③等,他们既受惠于第一世界的教育熏陶,又根植于出生地的广袤母语,他们的创作破坏了西方对东方或非洲的虚妄叙述,冲击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幻影”之说的自在预想。这样的文学,由于它是用一种西方读者和殖民地读者都能阅读的语言(如英语)写作,更由于它对西方叙述的有意识的模拟、分裂、瓦解和混杂,因而能够直接与西方话语形成交锋和冲突。^④由此看来,这些原本被剥夺了“冠名权”、受西方话语“宰制”的“历史”与“现实”反过来却成了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内在基石。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时代语境

毋庸置疑,要想客观全面地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实绩作出评判,一定要结合中国本土的时代语境,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维度进行分析。

1. 文化维度:东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的冲撞交汇,使得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各种文化形态,共时性地相互渗透、纠缠、并置于同一时空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特定的历史际遇和空前复杂的文化背景,

① 拉什迪 1947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其长篇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NY: Viking, 1988),因激怒伊斯兰教而曾被有关组织列入“死亡黑名单”。拉什迪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Cape, 1981); *East, West* (London: Cape, 1994) 等,获得过一些重要奖励。是第三世界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有关简介请参见 *Salman Rushdie 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0), 书前插页。

② 其代表作主要有: *Tasks and Masks: Themes and Styles of African Literature* (Harlow, Essex: Longman, 1981); 以及 *Home and Exile and Other Selection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3)。

③ 其代表作主要有: *Black and White* (London: H. Hamilton, 1980); *A Hot Country* (London: Abacus, 1984); *Beyond the Dragon's Mouth: Stories and Pieces* (London: H. Hamilton, 1984) 以及 *An Unfinished Journey* (London: H. Hamilton, 1986), 等等。

④ 徐贲:《“第三世界批判”在当今中国和处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 年第 2 期。

使得当下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拥有西方人所不具备的“包容性”，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个人想象和集体自我形象的重塑空间。

2. 认识维度：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话语是把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而 90 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个时期的大众仍然需要启蒙，是批判性的启蒙，或所谓的“新启蒙”。

3. 思想维度：近代以来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主要是以追求现代化（西化）为精神导向的。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

4. 大众生活维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百姓生活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政治的强力和阴影越来越退出日常生活的表层，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商品化。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国民在舒筋活骨、丰富生活本身的同时，也使拜金主义和个人欲望膨胀得无以复加，肉体和本能的刺激消解、扭曲和玷污了大众曾经有过的追求、理想、道德、情操和人格；受商品浸染的大众文化更以种种隐私、诱惑、欲望将传统、经典和先锋艺术改写面目全非，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市场化过程中，成为追求自我却又失去自我的“空心人”或“精神侏儒”。

5. 经济学维度：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注定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的“落户”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如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混合，市场与国家间的重叠，外企独资、合资和港、澳、台企业的“登陆”以及中国本身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等共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开放的胸襟和广纳博取的改革姿态推进社会整体前进的“新阶段”，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下个体身份的具体表现。

6. 法制维度：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越来越严谨，法律条例也越来越细致，

法制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囚徒困境”的现代个案也越来越多,但“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和“知法犯法”的现象和事实仍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以激进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法律故事学)、批判种族主义法学为主的后现代法学也在中国社会占据了一席之地,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曾长期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弱势群体进入了社会的视线。

诚然,上述这些归纳只是粗线条式的一孔之见,是个人的经验和感悟,因为中国的历史、知识、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千差万别,任何企图归类的做法都将面临“将复杂事情简单化”的质疑,因而,上述各个方面的“镜像”都只能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局部问题的侧影,显示出中国社会与第一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态势,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彰显出其独有的特色。这样的语境特色,必将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胶片上“镜现”出自己独具的形象。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冲击

当经济全球化日益彰显中国影响力的时候,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考场上也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不仅赢得了国际同行应有的尊敬,而且为中国的文化输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民族特征”的一种镜像,中国新时期文学像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场域——既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压抑,又反过来对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形成冲击。冲击来自压抑的反弹,而话语压抑则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对第一世界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借鉴、移植和模仿,并表现出足够的认真、十分的谦卑和巨大的热情,因为,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这说明,第三世界文学发展的本身是建立在第一世界的话语“投射”的“阴影”之上的。

具体说来,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的起起落落与西方思潮的“输入”有着很大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对“现代派”理论书籍的抢购狂潮到90年代人们对“后现代”和“后殖民”等理论的激烈论争,从苏